

## 郭良平)专栏 寻找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苗

今年5月7日，在一次与外商的座谈会上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句话：“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”，燃起外界用改革破解目前困局的希望。但观察国外学术界、舆论界、政界、商界等的舆论，对中国面临的问题的理解，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都没有新意；中国国内的讨论除了几个新词，也都是老生常谈。指望此次中共三中全会像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，出台石破天惊的改革，恐怕要失望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人们讨论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时，用的是同一套概念和理论体系，看问题的角度、分析的方法和得出来的结论，也大同小异。

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应付的：市场需求不足、产能过剩、贫富两极化、利率、通货膨胀、债务、产业链外迁、失业、楼市和股市泡沫、财政和贸易赤字、贫困、医疗和退休基金入不敷出等等。在这些现象下面，中西方都面临同一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：经济在产能上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质需要，却又在大批人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，不得不大规模去产能，让更多人生活没有着落。

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，中国也是从金融角度来分析经济状况的，两者都有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脱节的问题，都染上资本主义的原罪：巨大财富中的持续贫困。债务是金融经济运行的结果，同实体经济没有必然联系。人们算资金账时一片短缺的哀鸿，算实物账则是另一番景象——产能过剩。在40余年持续增长后，中国似乎也进入资本主义的周期时代。老百姓在往钱眼里钻，政府则被串钱的绳子牵。

对于以上问题，资本主义有一套成熟却无效或治标不治本的疗法：无非是撬动利率杠杆、刺激消费、增加就业、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、扩大出口、放宽政府管制等，都出自同一个工具箱，中西共用。很快双方会面临同一个困境：资本主义推动下的新技术革命，正在使增长和就业脱钩，使宏观经济政策失灵。财富都在朝着1%的顶尖富豪积聚；在美国，大批中产家庭跌回社会下层；中国也面对中等收入陷阱。经济衰退周而复始，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永远无解。大家都期盼的重大改革，实质是变得更像发达资本主义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中国朝那个方向的改革提高，能达到的最高水平，也就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举案齐眉，同舟共济。

### 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？

资本主义历史功绩至伟，但代价是马克思所说的“异化”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指出：“人们生活的必需品，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都可以得到”，那是250年前了。为什么至今人们仍在为生存而挣扎？富裕如美国，仍有13%的人受饥饿威胁，又如何解释？人们会说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无限提高，不断将奢侈品转换为必需品，正是资本主义维持生产方式的阴谋，只有人们欲壑难填，方能不断扩大市场。就连中国都上当了：现在正大搞“以旧换新”，扩大内需，殊不知这样做不但给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，也逼得人们更努力工作、挣钱、内卷。物质水平上去，生活质量却下降了。联合国年度《幸福报告》表明，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上世纪90年代攀顶，那之后一路下降。爱因斯坦评论道，现代人连享受非常简单的乐趣——如欣赏一朵野花、哼个小曲——的能力都丧失了。

庄子曰：“鹪鹩巢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，但人们为生存和“成功”的挣扎和奋斗却愈演愈烈。上世纪20年代凯恩斯这样描写资本主义下人的荒谬：“我们必须保持贫穷，因为富有不会带来‘收益’。我们必须住在小屋里，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建造宫殿，而是因为我们‘买不起’……我们破坏了乡村的美丽，因为未经利用的自然风光没有市场价。”无时不在、无孔不入的算计，使“整个生活的行为都变成了对会计师噩梦的模仿”，他认为这是“自我毁灭”。普罗大众只希望有稳定的收入——衣食无忧而已。稳定的工作、安定的生活是多数人的第一需求，但也是市场无法满足的。无法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，不能不说是根本缺陷的制度。

### 社会主义再认知

根据历史唯物主义，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替代。但如今国际舆论场上“社会主义”仍是个贬义词，也是西方要同中国打冷战的原由。要为社会主义正名，就必须回到它的第一性原理。社会主义，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政治主张，是社会的主义，不是国家的主义，也

不是经济的主义。社会主义源自人的本性，是数十万年人类在群体生活中进化出来的本能：要求平等、互相有个照应、有安全保障，而不是一个人在市场大潮中单拼独斗。

中共的社会主义还添加了政治本能：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。在改革的喧闹中，人们往往注意不到中共的一个心病：它的初心是搞社会主义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却一直无法付诸实施。曾记否：2021年8月，各大官媒纷纷转载署名为李光满的檄文：《每个人都能感受到，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！》，其时正值中共再次树起“共同富裕”大旗。很显然，这是借一介草民之口抒发心声，也是放出一个试探气球。但它招来了国内外广泛的责难和质疑，说中共要走回头路了，引起资本的恐慌。于是高层频频出来表态：绝不劫富济贫，做大蛋糕仍然是第一位的。于是，这场“深刻的变革”无疾而终。

中共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结为“共产党的领导”，但党的领导未必是社会主义。毛泽东在1976年如此批邓：“搞社会主义革命，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，就在共产党内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”

党变质了，党的领导就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实质。同样，新质生产力也未必是社会主义——它也可以为资本家服务，替资本家赚大钱的同时让工人大批失业。必须打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奴役，这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试金石。现在企业和政府都在算资金账而不是实物账、拨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算盘。金融是经济的血液，应为实体经济服务。如果资金的流动没法将生活必需品派送到需要的人手中，就须想别的办法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中国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条件和手段，来为“以人为本，以人民为中心”提供制度保证。新社会主义的内涵还包括解放生产力：将生产目的从利润最大化，转为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”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还无法做到的。

党变质了，党的领导就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实质。同样，新质生产力也未必是社会主义——它也可以为资本家服务，替资本家赚大钱的同时让工人大批失业。必须打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奴役，这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试金石。现在企业和政府都在算资金账而不是实物账、拨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算盘。金融是经济的血液，应为实体经济服务。如果资金的流动没法将生活必需品派送到需要的人手中，就须想别的办法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中国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条件和手段，来为“以人为本，以人民为中心”提供制度保证。新社会主义的内涵还包括解放生产力：将生产目的从利润最大化，转为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”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还无法做到的。

党变质了，党的领导就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实质。同样，新质生产力也未必是社会主义——它也可以为资本家服务，替资本家赚大钱的同时让工人大批失业。必须打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奴役，这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试金石。现在企业和政府都在算资金账而不是实物账、拨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算盘。金融是经济的血液，应为实体经济服务。如果资金的流动没法将生活必需品派送到需要的人手中，就须想别的办法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中国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条件和手段，来为“以人为本，以人民为中心”提供制度保证。新社会主义的内涵还包括解放生产力：将生产目的从利润最大化，转为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”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还无法做到的。

### 邓小平之误

邓小平并非走资派。他允许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目的，是带动其余的也富起来。中国人口基数庞大，人均收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，但实行社会主义就可能让老百姓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。但是，市场经济不存在先富带后富的机制；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争，困难点在于做蛋糕同分蛋糕是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，做蛋糕者自然拥有所做的蛋糕，不让他拥有，他就不会再去做了。改革开放前的公有制企图将两者分开，国有企业生产的东西国家全部拿走、统一分配，结果是生产积极性没有了。生产搞不上去，大家就扎堆拼抢仅有的那块小蛋糕。

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。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，是生产力极为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。马克思和毛泽东时代以及中国古代都是短缺经济，现在则是普遍过剩，但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过剩，是针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，支付能力之外仍有贫穷。但产能过剩根本改变了政策环境，坚持以短缺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旧思路，就无从搞社会主义。探索和建立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和“以人为本”仍缺乏可靠的制度保障，就必然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，从大政府的旧社会主义转为大社会的新社会主义。这一点邓没有想到。

###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

当代资本主义已发育成一个庞大、完整、复杂的，囊括人类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，左右人们思维和行为习惯的，无所不包的大体系。“市场规律”（即资本主义法则）成了天经地义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脱不开它的框架。这套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也为社会主义设下陷阱：长期以来，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，“社会主义”都成了大政府的代名词。

2021年发初心而无疾而终，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新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，无法理直气壮；而旧社会主义那一套已入历史垃圾箱，再用起来总觉得理亏。

在市场化 and 全球化中狂飙突进几十年后，回归社会主义面临大批实际问题和理论准备不足的尴尬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刚开始一定幼稚，会被嘲讽，但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结果，因为它针对的都是实际的、迫在眉睫的民生大问题。中国新建的1400多所马克思主义学院聚集大量人才资源，应大有用武之地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